

汪少华 著

# 中国古车輿名物考辨

孙诒让研究丛书 许嘉璐 主编



商務印書館

孙诒让研究丛书 许嘉璐主编

# 中国古车與名物考辨

汪少华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5·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车舆名物考辨/汪少华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孙诒让研究丛书)

ISBN 7-100-04524-X

I. 中... II. 汪... III. 车马器—考古—中国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890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O Gŭ CHEYU MINGWU KǎOBIÀN

**中国古车舆名物考辨**

汪少华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524-X/H·1124

---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1/2

印数 4 000 册

定价:15.00 元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

**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

## 《孙诒让研究丛书》序

许 嘉 璐

此丛书为近年研究孙诒让最新成果之汇集。凡四册,《年谱》不与计,所论盖皆有关《周礼正义》者。

《周礼正义》,孙著之佼佼者。其为学也,举凡农耕时代之学,无不洽通,是以欲探其曠奥,需备相应之学养,所谓不得睹宫室之美,亦应知其门墙耳。今之学者,始乏幼功;既长,古今中外、数理化文皆所必学;至若涉古之学,泰半专攻一端,既广涉之不及,则论仲容仅得窥其一体,必矣。

璐得润溉于慈溪颖明先生及三台仲珪先生几四十年。承训之时,二老每言及仲容之学。有所请益,颖师或曰:“何不请教《周礼正义》?”且告以太老师蕲春黄先生语:“仲容之《周礼正义》,点水不漏。读之,[典章制度]他书不必寻查矣。”且命点读之。1961年,璐随萧师忝与统编教材《古代汉语》之役,即以随身。萧师知之,谓读此可以粗谙《周礼》之学,若加之以《礼记》——宜以孙希旦《礼记集解》为初阶,增之以《仪礼》——可先之以张尔歧《仪礼郑注句读》,继之以胡培肇《仪礼正义》,则先秦以至后世制度之沿革,可以了然于心,即或翻检“通考”之类亦不徒知其然矣。璐谨遵师训,不敢少懈,即至琉璃厂肆觅得三书,常夤夜读之。然终无专治礼学之奢望,以稍窥闾奥则愈知其艰,而已非治之之材故耳;且旋即运动

频仍，亦不遑顾及。

逮及 1990 年，有同道昌翻译“十三经”及“诸子集成”之议，囑璐领其事，议定各书均邀名家。承师友纷然慨允，唯《周礼》、《仪礼》无着。其时经学大家黄寿祺先生（吴检斋高足）已谢世，他人多所婉拒，而交稿时日渐近，不得已，璐遂勉力承乏，诚所谓知其不能而为之者。本欲有所参照，遍寻书林，唯得林尹先生《周礼今注今译》，亦过简略，难敷所需。于是白日劳累之余，孤灯之下，左置孙氏《正义》，右展稿纸，逐行逐句重温以译之。旧日点读者，亦已积尘，开卷，每见所标疑问。既为通译，固可置之不顾，一以郑孙为本，然终为心中块垒也。既知自解之无日也，固当敬俟来者。

时至 21 世纪，汪少华、朱小健、朱瑞平先后从余游。少华着力于《考工记》，多有所获；小健、瑞平亦有意于孙学。少华雅好考据，小健善于抽绎，瑞平则长于条分，皆适于深研《周礼正义》者。未几，三生论文相继告成，学界既嘉诸生用力之勤，余亦乐见其学术之进，复如一释长年之负。吁！昌黎有言曰：“弟子不必不如师。”庄子曰：“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其是之谓乎？

少华穷究《考工记》器物名实之辨，是可证时人考古命名之正误，亦系连二学之实验，当世似尚无深思实践如彼者；小健概论《周礼正义》训诂之得失，前人涉此者盖寡，世所谓孙氏集清学大成者，应首推训诂，故其所述应有益于学界；瑞平总论仲容学术之成就，旁及其音韵、文字以及墨学、时政，至若《年谱》则瑞平论文之附篇，亦其研究入手之处，盖欲知其人，须先明其事也。四书大体以《周礼正义》为的，而未拘焉。然孙学岂三生所能穷者，即其所述当否亦有待大方鉴之。余所望者，唯三生之作得为

引玉之砖；复愿三生拾级以进，终生以浮躁为戒。如此，余即或无成，亦无憾矣。

2005年5月立夏之日

于北戴河旅次

# 目 录

|                              |       |
|------------------------------|-------|
| 《孙诒让研究丛书》序 .....             | 许嘉璐 1 |
| 一、绪论 .....                   | 1     |
| 二、考辨 .....                   | 26    |
| (一)“鞞鞞”考 .....               | 26    |
| (二)从秦始皇陵出土铜车看“綰”的部位与形制 ..... | 48    |
| (三)论“胁驱”及其革带的定名 .....        | 69    |
| (四)“駟”与“介马”考辨 .....          | 86    |
| (五)“鞞”“纷”考辨 .....            | 103   |
| (六)“鞞”“较”献疑 .....            | 122   |
| (七)“登軹而望之”的训诂与考古考察 .....     | 148   |
| (八)从“伏兔”看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的关系 .....  | 176   |
| (九)从出土车輿看“辅车相依” .....        | 188   |
| 三、附录 .....                   | 214   |
| (一)“交綰”“死綰”考辨 .....          | 214   |
| (二)“继”非弓鞞 .....              | 224   |
| (三)试论秦始皇陵铜车内铜方壶的定名 .....     | 228   |
| 四、参考文献 .....                 | 244   |
| 后记 .....                     | 256   |

## 一、绪论

中国古车舆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夏代:

《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世本》汉·宋衷注:奚仲“夏禹时人也”。禹时既设车正,足以证明制车在夏代已是具有一定成熟的技术。<sup>①</sup>

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夏代及其前的车。考古发掘中所见古车遗迹,最早是商代晚期的<sup>②</sup>;1996—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偃师商城城墙内侧发现了商代早期路土上留下的双轮车辙,更将中国使用双轮车的时间提早到商代早期<sup>③</sup>。

---

① 孙机《中国古车制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化的馈赠·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吴晓筠《关于中国马车起源问题研究的述评》指出:“战国晚期到汉代的文献如《世本》、《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君守篇》、《淮南子·修务篇》、《论衡·对作篇》、《后汉书·舆服志》、《说文解字》等皆有奚仲作车的记载。”(《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11期,2001年12月)

② 参见孙机《中国古车制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指出:“这是基于现代考古学的事实,举世公认,因为考古学者在曾是商代晚期都城的安阳殷墟及其以外地域,共发现近百辆完整而实用的商代马车物证——战车。”(《寻根》1998年第4期;又载《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③ 参见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吴晓筠《关于中国马车起源问题研究的述评》。

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的《考工记》<sup>①</sup>,其《轮人》《舆人》《辀人》《车人》等章节,对于先秦车輿制作曾有详细记述。《考工记》于西汉时已收入儒家经典《周礼》中,因此备受古代学者重视。东汉末有郑玄的注,郑注廓清经义,阐述融通,注文中的许多说法可以视为经文的补充。清代朴学大兴,清代学者颇致力于《考工记》中所记车制的研究,成果累累。例如江永的《乡党图考》、《周礼疑义举要》,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戴震的《考工记图》,阮元的《考工记车制图解》,郑珍的《轮舆私笺》,王宗淦的《考工记考辨》,钱坫的《车制考》,各有发明<sup>②</sup>;其中绘图以配合者,颇便读者理解<sup>③</sup>。尤其是孙诒让《周礼正义》“博采汉唐以来迄于乾嘉诸经儒旧诂,参互证绎”,将清代数十百家学者的精言胜义收采无遗,替我们作了总结账的工夫。其中卷七十四至八十六为《考工记》部分,对《考工记》的注释、考证和研究,至此堪称集大成。然而《周礼正义》出版(1905年)至今已届一个世纪,而20世纪正是地下出土文物绵绵不绝的百年。自1928年殷墟发掘出商代车马坑、1950年辉县琉

---

① 《考工记》成书年代,一直聚讼纷纭。据闻人军《〈考工记〉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介绍:郑玄漫言“前世”,孔颖达以为是西汉人作,贾公彦、王应麟等认为是先秦之书。自顾炎武以降,注重考据,研究逐步深入,诸家争鸣,形成了下列几种代表性的观点:(1)春秋末年成书说,代表人物郭沫若。(2)战国后期成书说,代表人物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126页)、史景成(《考工记之成书年代考》,《书目季刊》,1971年春季5卷3期,台北)。(3)战国时代(阴阳家)成书说,代表人物夏纬瑛(《〈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4)战国初期成书说,代表人物杨宽(《战国史》第81页)、王燮山(《“考工记”及其中的力学知识》,《物理通报》1959年第5期)。闻人军则考证成书于战国初期。

② 李强《清儒对〈考工记〉车制研究》(《中国科技典籍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以清儒对郑玄注的理解为依据,分别对江、戴、程、阮、郑、王等六家的研究进行复原,绘出复原图。

③ 参见孙机《中国古车制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琉璃阁出土战国车舆以来，古车在全国迭有发现，出土之先秦古车总数已经超过百辆。这是清代学者所不得见的。数十年来，考古学者在古车舆研究中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成果涌现，不仅有相关的发掘报告，而且发表了专论、出版了专著。

包括车制在内的典章、制度、礼制、名物研究，一直是传统训诂学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现代训诂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内容。据陆宗达先生介绍，洪诚先生曾对三《礼》下过多年的功夫：

年轻时适逢国难，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也手不释卷，卷帙浩繁的《周礼正义》点读过六遍，枯燥琐细的《仪礼》至今还能流畅地背诵。他还向我介绍了治《礼》的心得。我佩服他的功底之厚，见解之高，他却说：“当年立志搞《礼》学，还是季刚先生指点的。先生对我说，三《礼》与小学以及社会史、文化史都有密切关系，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研究，以你的年岁，还来得及。老师的几句话，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啊。”<sup>①</sup>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专著和词典。例如：钱玄先生《三礼名物通释》<sup>②</sup>分为衣服、饮食、宫室、车马四篇，简明扼要。钱玄先生《三礼通论》<sup>③</sup>、钱玄、钱兴奇先生《三礼辞典》<sup>④</sup>堪称三礼力作，前者就礼书、名物、制度、仪礼四编各列若干专题，综述形制，考订原委，征引前贤研究成果，详加辨正；后者更将《仪礼》《周礼》《礼记》《大戴礼记》中有关典章制度礼制名物等

① 陆宗达《〈训诂学〉序》，洪诚著《训诂学》，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②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③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④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5000 条词语分为 32 类(“车马”一类条目逾 200)。钱氏三书,于出土材料与成果均颇加择用。许嘉璐先生《中国古代衣食住行》<sup>①</sup>介绍古代的服装佩饰、饮食器皿、宫室起居、车马交通,着眼于深入浅出,讲述所及,皆具词义分析、文献例证,不乏精到考辨。许嘉璐先生主编《中国古代礼俗辞典》<sup>②</sup>分为服饰、饮食、居住、行路、交往、婚姻、丧葬、祭祀、宗族宗法、姓名字号、节日、军事、区划、职官、刑法、教育、科举等 17 类,本着探源析流原则,对礼制风俗命名之源及其流变予以解说。黄金贵先生《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sup>③</sup>在文化史的系统中间辨考词义。全书 1306 个词,构成 262 组同义词,每组成为一篇辨考文章,若干意义相关的篇章汇成一个物类,共有国家、经济、人体、服饰、饮食、建筑、交通、什物 8 大类,逾 110 万言<sup>④</sup>。至于教科书,20 世纪 60 年代初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就列入古代文化常识 4 篇,从天文地理到职官科举、从礼俗宗法到宫室车马,简洁明了,涵盖面广;80 年代初郭锡良先生等编《古代汉语》,依然保留了姓氏名号、职官、地理、历法等 4 节。各大学中文系还开设“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或“中国文化史专题”选修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选修课曾结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sup>⑤</sup>出版。

然而,对于典章制度礼制名物的关注,似未能蔚为风气;在出

---

① 北京出版社 1988 年。

②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

③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④ 陆锡兴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以历史文献为线索,贯穿全部古代器物,包括乐器、兵器、刑具、文具、舟车、牌符、服饰、纺织、工具、床帐、灯镜、礼仪、博戏、器皿、珍宝、钱币、建筑等 17 大类,目前已经出版器皿卷、兵器刑具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2004 年)。鉴于他以文字学、文物学名家,故未列入此处。

⑤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84 年。

土文物、考古成果大量涌现的数十年中,虽然有黄金贵《古代文化词语考论》<sup>①</sup>、滕志贤先生《从出土古车马看训诂与考古的关系》<sup>②</sup>等力作问世,但就总体而言,呈现式微之势。1988年,许嘉璐先生《关于训诂学方法的思考》一文就敏锐地揭示了现代训诂学出现的这种封闭性:

传统训诂学以训释实践为其主要形式,以文献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为其对象,因此它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语言以及用语言形式表现的名物、典章、文化、风习等等都在其诠释范围之内。现代训诂学开始了对诠释工作的理论研究,更重视训诂学的语言学性质,削弱了对语言所表现的内容的注意。近几十年又由于学科的分工,治训诂者也相应地习惯了对语言规律的研究而对社会的、文化的现象却生疏了。这样,训诂学出现了封闭性。<sup>③</sup>

这种封闭性,一方面表现为训诂学者普遍地渐渐疏离包括车马在内的典章制度礼制名物的研究;表现为训诂学者漠视出土文物<sup>④</sup>,忽略考古学、科技史成果的营养。试举一例:《诗经》吟咏过

---

①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② 《古汉语研究》2002 年第 3 期。

③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收入《未辍集——许嘉璐古代汉语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④ 这里主要是指出土文物而不是指出土文献,例如出土简牍和帛书的研究中就不乏训诂学者身影。相形之下,古籍整理中的情况要好些。裘锡圭先生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呼吁防止“对地下材料不够重视的倾向”(《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1 年第 6 期,收入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一再强调“考古资料对这些著作时代早的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显得特别重要”(《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文史知识》1986 年第 8 期,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左传》有谚语“辅车相依”。杜预注：“辅，颊辅。车，牙车。”王引之、段玉裁、王筠先后撰文反驳杜注，认为是车器。其驳论证据确凿，说理透彻；“颊辅”说之不能成立，昭然若揭。然而由于“辅制失传”，无法对其形制作出描述，以致立论可信度大打折扣。因而清儒虽然大多同意为车器，但是具体部位和形制，则是众说纷纭。现代学者或依辅颊说，或从车器说，莫衷一是。其实，出土车輿和考古成果，为车器说提供了证据。20世纪50年代初，河南辉县出土的第16号战国车輿，车辐装好后均向内偏斜，从外侧看，整个轮子形成一中凹的浅盆状，《考工记》称之为“轮纒”，它使辐形成内倾的分力，轮不易外脱。当道路起伏不平时，纵使车身向外倾斜，由于轮纒所起的调剂作用，车子仍不易翻倒。但如果负载过重，或是行进于泥泞险阻的道路，这种中凹形的车轮，轮牙的构造就必须具有极强的切向牢度，于是而有对付拉力的2根“辅”——失传的辅制再现目前。考古学家指出这就是“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和“辅车相依”的“辅”。可是直到半个世纪后发表的持车器说的训释论文，并不利用出土实物，多半还在重复清儒的证据<sup>①</sup>。

又如《左传》“登轼而望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或质疑旧读，认为应标点为“登，轼而望之”，理由是轼只是手握的一根木棍，不可以站脚。即使站上去，脚既站不稳，身子又四面无依傍，所以实在不可登。此文发表后，反驳者众多，于是形成一场讨论。说有易，说无难；断然否定可能性与承认某种可能性，显然后者胜出。经过那场讨论，训诂学界渐渐形成共识：“轼”可“登”，

---

<sup>①</sup> 详见本书考辨部分《从出土车輿看“辅车相依”》。

“登軾”不宜断开。然而,直到世纪之交,训诂学者撰长文考论古軾形制,纠正对车軾的误解,大多仍不出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戴震《考工记图》的范围,殊不知清儒对车軾、车轳的论断与出土先秦车輶不甚相符<sup>①</sup>。

文物素养的缺乏,必然导致训释失误。例如“交绥”出自《左传》,或释“绥”为车中把,认为两军激战,短兵相接,在冲杀中连战车的“绥”都互相纠结在一起了。这是对战车与车战缺乏了解:两车正对面驶来的情况下,车上的乘员无法互相格斗。即使双方的马头已经互相顶撞在一起,两乘车的车箱前沿还至少有4米以上的间隔。战车的轮径大,车箱宽而进深短,又是单辕,为了加大它的稳定性,车轂必然要长。两车错轂时,两辆车的车箱侧面之间的距离,最少也在1.1米以上。可见,两军激战哪怕“车错轂兮短兵接”,两车上的绥也不至于“互相纠结在一起”的<sup>②</sup>。

训诂学出现的这种封闭性,另一方面表现为不愿意伸展到考古学、科技史领域中去。许嘉璐先生1995年曾指出:

大约十年前,我深感训诂学、文字学到了必须向文化学领域伸展的时候了。传统“小学”原本对文化现象是十分关心的,但是当它向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比较彻底地离开了经学附庸的地位之后,也就远离了文化。……传统“小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本身就是文化,或者说“小学”就是为文化的阐释而产生的,而那个时期文化的最集中的记录则是经书。尔后的“小学”与文化的分离实际上是违背了其本有的规律。……

① 详见本书考辨部分《“登軾而望之”的训诂与考古考察》。

② 详见本书附录部分《“交绥”“死绥”考辨》。

“小学”观照文化学,从文化学和广泛的文化现象中吸取营养,同时文化学得到“小学”这一利器的帮助,可以挖掘得更深,更接近真实,这种双向的介入和靠拢,或者称之为交叉、渗透,是历史的必然。<sup>①</sup>

诚哉斯言。就车制而言,“由于独辔马车见于儒家经典,收入《周礼》的《考工记》对独辔车的构造和性能有较详细的记载,因而探讨先秦车制遂成为后世经学家的一项研究课题”<sup>②</sup>。然而时至现代,随着先秦古车的陆续出土,车制研究由传世文献探讨转为出土实物考察,客观上缺乏近水楼台的便利,主观上重视本体理论研究的训诂学,顺从学科的条块分界,放弃自家的传统职责,于是车制研究成为考古学的独角戏。偏偏文物考古专家强调文献记载对于车舆定名的决定性作用:“作为车制研究的第一步,首先应认识、复原车体的结构并考察、确定车马具的名称。为此,除实物资料外,尚须借助文献记载,特别在定名问题上,更不能不从文献中找依据。”<sup>③</sup>“更不能不从文献中找依据”,这原本是训诂学的长项。但在古车舆器物的定名和辨认中,训诂学者是缺席或沉默的。例如“绥”是登车时用以拉手的绳索,古今训诂著作众口一词。但是,“绥”之形制及其在车舆的部位,从未见过实物证据。20世纪80年代,秦始皇陵铜车马出土,文物专家对于“绥”有四种意见:或认

---

① 《〈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序》,《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年;收入《未辍集——许嘉璐古代汉语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孙机《中国古独辔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第8期,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③ 孙机《中国古车制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化的馈赠·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为是二号铜车輿内的一件鞭状物,或认为是一号铜车盖杠上部之带,或认为是系在一号铜车輿御官腰间的一条编织宽带,或认为是系于车轼上的组带或绳索。对于这些歧说和争论,训诂学者本应及时介入,然而迟迟没有回应<sup>①</sup>。

当然,由于相对缺乏考古功力与文物鉴别能力,亦缺乏现代科技素养,因而向考古学、科技史领域的伸展,训诂学者必须补课钻研、“两栖作战”,了解新领域的基本情况,培育专业素养,熟悉相关成果,关注最新动态。现将古车輿研究以及《考工记》研究著作,简述如下:

其中卓有建树者,首先是《殷周车器研究》<sup>②</sup>。此书是郭宝钧先生<sup>③</sup>的遗著,初稿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为此书作《序》评介如下:

《殷周车器研究》一书是郭宝钧先生从事考古工作四十多年对于殷周车制研究的总结。早在三十年代初期,郭宝钧先生主持浚县辛村西周卫墓发掘时,开始接触周代的车器和车迹,并开始进行研究,直到他逝世(1971年)为止,从未放松对殷周车器和车迹的观察和钻研,最后终于完成这一著作,其精神是可佩的,其成就也是可观的。

殷周车制的研究,最早起于汉代,当时大概以汉代的车制来比附殷周的车制,但是毕竟距殷周太远,不可能对殷周的车

① 详见本书考辨部分《从秦始皇陵出土铜车看“绥”的部位与形制》。

② 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③ 郭宝钧(1893—1971),192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28年参加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20世纪30年代又多次参加和主持小屯村一带殷墟宫殿的发掘,1930—1937年任职于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